

9

江山文史資料

第1期

324/00

浙江省江山縣政協秘書處
江山縣志編纂辦公室編印

目 录

张鼎丞在江山指挥剿匪战斗.....	苏 明 (1)
“假戏真做”——军统局内幕之一.....	王绍谦 (6)
江山县选举国大代表拾另.....	严松年 (13)
修志参要.....	徐光邦 (19)
忆江山西河女校.....	徐再振 (25)
忆“若瑟”.....	王寿昌 (29)
小资料——报刊文摘.....	(31)
1. 叛徒张西林被捕	
2. 杭州最早的女主笔毛彦文	
3. 毛夷庚教授火葬	
• 稿约 •	(32)

张鼎丞在江山指挥剿匪战斗

苏 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在师政委范阳春和团长韩国锦的率领下，强渡长江天堑，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经东流、婺源、开化、常山，长驱一千余里，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经三小时激战，一举解放江山县城。该团以伤亡不到五十人的代价，歼敌五千六百余人，战后获四十六师的集体嘉奖。

五月廿四日，浙江省委工作队随军南下到达江山，江山工作队以苏明为党支部书记，赵子修和李春林任支委。接管江山县后，以苏明任中共江山县委书记，赵子修任县长，李春林任公安局长。我野战部队在江山稍事休整后，决定进军大西南。县委为支援前线，忙于征集粮草，而地方上匪情猖獗，匪特在江浦公路沿线抢劫杀人，凤林乡五天内遭劫四次，被劫一百二十户，官溪乡一次赶集被劫妇女七名，当时社会秩序很不安定，我们工作一时显得十分吃力。

七月间，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张鼎丞同志，随二十八军进军福建，来到江山。当时虽是炎热天气，但他不怕疲劳，深入

调查了解江山匪特活动情况及驻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在江山前后共住了七天时间。张鼎丞同志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晨八时，通知苏明、赵子修、李春林等同志去向他汇报工作，他那瘦瘦的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白衬衫，亲切热情，平易近人。张鼎丞同志分析了当时进军福建的形势，指出江山县扼闽、浙、赣三省要冲，境内群山环列，高屋建筑，是进军福建的战略要地。江山工作的好坏，对我军解放福建关系极大。但当时江山的白石、坛石、峡口等地土匪特务成伙，他们各有后台，番号杂七杂八，什么东南义勇军，反共救国团等等，到处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张鼎丞同志了解到上述情况，问我们当前工作以什么为中心？我们回答说：“以征集粮草支援战争为中心。”张鼎丞立即严肃指出：“不对。江山土匪特务猖獗，群众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生产不断受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粮草能征集得起来吗？你们应该立即把剿匪反霸作为县委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心，以剿匪反霸推动征集粮草。”

张鼎丞同志边说话边喝茶，目光炯炯有神，说话有条不紊。我们县委几位同志，听了张鼎丞同志的指示，顿开茅塞，觉得脑子清爽了许多。心想最近以来征粮工作忙乱，匪情又严重，以剿匪为中心，是提得多么及时啊！但又一想，工作中心问题原是地委的指示，就汇报说：“以征集粮草为中心，这个工作方针是地委确定的呀！”张鼎丞同志一听，非常严肃地说：“什么？地委确定的也不一定符合江山县的实际情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从目前的江山实际情况看来，如果我们不紧紧掌握以剿匪保民为中心，在四十八师全部离开江山之后，江山县委所领导的党、政、军、

民，不仅工作很困难，而且可能被迫陷入退却作劣势的游击战，会出现那种危险情况的。”

稍停，张鼎丞同志又说道：“当然，不能过高估计敌人，过低估计自己。敌人是残兵败将，散兵游勇，是全面失败之残存者，而我党、政、军、民则是全面胜利的雄师，是发展全面统治的胜利者。只要我们重视这一回事，掌握这个中心环节，很快就可以彻底而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巩固我们的全面胜利的。你们回去，马上召开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好好议论议论，订出工作计划，再送到我这里，同时给地委请示报告。”

辞别了张鼎丞同志，县委立即将情况向地委汇报。当时地委书记燕明正在省委开会。七月十八日，地委确定地委副书记、专员张华墀和专署秘书主任梁长庚到江山来，参加中共江山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新华社社论：“肃清土匪特务，巩固革命秩序”，同时传达了张鼎丞同志的指示精神，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确定江山县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的工作方针，着手制定具体工作计划。

与此同时，驻江部队四十六师政委范阳春根据张鼎丞指示，决定抽调一个连的兵力，由该师师部王辉科长指挥配合我们剿匪。为加强城防工作，又确定以王辉科长任江山城防司令，在全县各地张贴布告。那时，江山邻近的开化县曾经出现过匪特攻打县城的严重反革命事件，而我们江山县因为有野战部队扎根城乡，森严壁垒，防患于未然，敌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县委订好具体工作计划，遵嘱又到张鼎丞同志的住地——江山城内蓝田坊十一号向他作详细汇报。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七时，张鼎丞同志仔细审阅修改了我们县委的工作计划后，问我

们还有什么困难？我们回答说：“最大的困难是感到剿匪部队不足。要求领导派出一定数量的野战部队配合县委开展剿匪斗争。”张鼎丞同志当即写了给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的亲笔信，信中说明江山县的匪情和增派野战部队配合剿匪战斗的详细理由。写好后交给我，我叫县人民政府秘书袁利民专程送去。接着，省委就给江山县派来一个团兵力（先是309团，后是308团）在江山县剿匪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组成若干剿匪小分队上山下乡，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斗争。

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在二十六个乡范围内组织了一百八十四个农会，建立了五百二十个村自卫队，发展了八千三百七十七名村自卫队员和一千五百九十八名武装民兵，拥有钢枪一千零七十四支。一九五〇年一月，县人民政府先后举办了二期土匪集训班，参加集训的自新土匪四百三十四名。经教育当时释放一九三名，劳动改造二百零二名，其余罪大恶极而又不肯悔改者，予以扣押。

在剿匪斗争中，我保安区委书记金仲法同志不幸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子里庵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八岁。我和金仲法同志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在鲁中地区学习时相遇，此后在渤海之滨、微山湖畔、运河岸边，我们一同行军、打仗和学习。那时淮海战役结束不久，鲁南、苏北的条件比较艰苦，睡的是门板草铺，吃的是地瓜杂粮，许多同志病倒了，可是仲法同志却始终精神饱满。尤其他和我一同来到江山县，听了江山人民受匪特迫害的血泪控诉，便找着我说：“我实在坐不住了，请求赶快下去，解除群众痛苦。”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县委根据金仲法同志的要求，分配他到匪情最猖獗的戴笠老巢保安区任区委书记，金仲法同志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是我党

的一大损失。

江山县剿匪斗争的胜利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也是和张鼎丞同志的亲自指挥和关怀分不开的。县委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召开了全县民兵代表大会，大会到会代表156名，会议交流了剿匪斗争的经验，表扬和奖励了英雄模范人物。截至一九五一年底，全县共消灭土匪特务六十三股，缴获各种枪支二千二百五十五支，毙、伤、俘、降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人。在战斗中，我们以军事包围的方式消灭了东南义勇军大队长徐子林，逮捕并镇压了国民党保密局少将特务戴藏宜、戴春榜，基本上肃清了江山县残存的武装匪特，从而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推动了征集粮草工作，有力地支援了进军大西南的伟大斗争！

（毛作元 整理）

注：本文作者苏明，系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江山县委书记，现任辽宁省建委副主任。



“假 戏 真 做”

—— 军 统 局 内 幕 之 一

王 绍 谦

我于一九三七年六月考取军统局南京译电训练班，经过短期受训后，与同期同学王汉光（三卿口人）、徐昌俊（峡口人）等三人被挑选到南京军统局工作。南京撤退时，我编入随节组跟随在蒋介石身边行动。十二月七日凌晨，蒋介石起飞去武汉，我接到侍从室通知离开南京，乘汽车去汉口，带队的是军统局人事处长郑修元、交通科长胡子萍，我们到达汉口时，南京已经陷落。

开始时我在武汉军统局局本部任译电员。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跟随戴笠去河南郑州。此时蒋介石在郑州指挥作战大败，正在商讨撤退事宜，公务紧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从郑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蒋介石指派戴笠从信阳下车去开封办案，我跟随戴笠到开封后，于二十八日晚参加河南保安司令的宴会时，戴笠问我有几件急电译出了没有？我回答还有三件半没有译出。戴笠便指示说：“迅速译出，吃完饭我们就马上回汉口。”我一向不爱喝酒，吃饱饭就退席译电。当时有二种密码本，我都背诵得娴熟，所以译电迅速、准确。当戴笠退席、手上还拿着抹脸的毛巾来看我时，我已经把电报全部译好了，戴笠表示十分高兴。从此我便得到戴笠的信任，一直就在他身

边工作。当然这与我和戴笠同是江山人也有关系，平时我们常常用江山话交谈，这对戴笠来说可以起保密作用。

我跟随戴笠从郑州回汉口，住在法租界巴黎街八号之五戴公馆，任戴笠私人秘书（开始是少校，后升任中校），负责译电兼收发戴笠私人信件。戴笠中等身材，有一次他送我一套衣服，我穿着正合适。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去香港，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戴笠直接指挥下参予刺杀汪精卫的通讯工作。不久因为戴笠的妻子毛秀绒生病在上海住院，派我去上海代他料理妻子治病事务，我于一九三九年二月离开香港到上海，在上海随时将病情向戴笠报告。同年八月，戴妻毛秀绒患子宫癌病逝，我向戴笠报告后发电报至金华（当时的浙江省政府驻地）通知浙江省保安处谍报股转告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去上海办理他母亲的丧事。

我在上海的时候，同时担任军统局上海区的译电工作。军统局上海区最早的区长是周伟龙，以后是王天木，再后是曹立俊、陈恭澍。因为曹立俊的组织出了事，遭到破坏，我在上海站工作的时期正是曹、陈交替的时期。此时，戴笠对上海区的安全有些不放心，为保证军统上海区的工作不致中断，便指示姜绍谟另建立上海第二区，简称沪二区。由姜绍谟出任沪二区区长，建区之初，我负责协助姜绍谟解决开始时的译电工作。

军统局的译电科在一九三七年时，译电科长是姚敦文，以后有夏天放、刘杰，继刘杰的少将译电，组长姜毅英（女，又名鹤根，江山新塘边人），原来是搞电讯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汪精卫特工总部逮捕，由于我与钱新民常有联系，戴笠考虑我的安全问题，拍发电报要我离开上海去香港转重庆。我于一九

四〇年十二月廿七日由香港乘飞机到重庆，和军统局局本部外交秘书王蒲臣（我的堂叔，后来曾任军统局北平站少将站长）住在一起。三天之后，戴笠就亲自来接见我，除对我的工作当面嘉奖外，决定我一面参加外事训练班受训，一面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住在杨家山戴公馆。这时，戴笠在重庆共有三个公馆，王汉光在曾家岩戴公馆，戴笠的外甥女胡秀鹤（江山官溪人）在最秘密的神仙洞戴公馆，当总管。

回顾我在戴笠身边工作的历史，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是军统局在蒋介石的导演下，演出了若干有声有色的假戏真做的丑剧，现在将戴笠暗杀汪精卫的一幕，追忆如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因为得到蒋介石的默契，顺利地由云南到达河内，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关于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的号召，实行中日亲善，组织南京政府。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稍有爱国心的人莫不义愤填膺，舆论对重庆政府公然放任汪精卫出走多所指责。蒋介石为了制造假象，欺骗舆论，立即指派军统局头目戴笠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飞抵香港。

戴笠到香港后，住在铜锣湾晚景楼内公寓里，策划对汪精卫的制裁（暗杀）行动。戴笠打电话给军统局香港站秘书刘方雄（江山吴村人）调我到铜锣湾公寓担任译电工作，并指定由我每夜把译好的电码亲自送到簿扶林道64号电台去拍发。接着，戴笠就派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翹，在香港办好出国护照手续，先到河内，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总领事许念曾）为行动指挥所。陈恭澍、王鲁翹就住在领事馆内密谋策划。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

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护照手续，分批前往河内，由戴笠指定陈恭澍担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翹指示目标（因王鲁翹认识汪精卫）。当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对陈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逆精卫的工作，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

上述所有有关人员都先后到达河内几天后，戴笠便用何永年的化名，办理好出国护照手续，到河内去亲自检查布置工作。行前，戴笠叫我留在铜锣湾公寓负责收转来往电报工作。

综合来往电报的内容，并联系陈恭澍、王鲁翹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底从河内返香港时面谈的经过情况，这次布置制裁汪精卫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的：

1. 经陈恭澍短时期的密谋，并由许念曾的协助，弄清了汪精卫在河内住处的布置情况，并搞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

2. 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色是由一家面包店每天准时送去的情报之后，就研究决定由行动组把送面包的工人拦截下来，换了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妆送面包的工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被退回；

3.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有一天得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理他浴室的水龙头，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扣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子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慢慢弥漫全室，只要汪精卫晚上进浴室，就会中毒倒下，结果，汪精卫恰恰三天没进浴室。

4. 当许念曾、陈恭澍获悉汪精卫第二天要去离河内七十里路的地方去旅游的情报后，就作出拦路阻击的行动计划报请

蒋介石批准，由陈恭澍、唐英杰率领行动员分乘二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确在车上后立即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之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就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动手。不料，汪车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也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追上时就立即动手，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脱身的安全撤退问题了。在陈恭澍车子调头后，紧接着那辆警备车又驶过来了。二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在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二辆追击车被阻，这次狙击行动就此告吹。

5. 陈恭澍一伙回到了领事馆，连忙开会商讨分析，认为这次狙击未遂，情况已经暴露，暗杀已转为正面交锋，如再拖延时日，汪精卫肯定要加強戒备，无从下手。于是决定趁热打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当夜直捣汪寓，进行武装袭击，作孤注一掷。具体计划是：派四个行动员在汪寓前后进行警戒，由唐英杰纵上花园围墙，剪断电网，然后帮助另四名行动员及王鲁翹翻墙进入花园，四个行动员负责对付汪精卫卫队，唐英杰和王鲁翹直闯汪的寝室，由王鲁翹指示目标，由唐英杰用小斧头或手枪执行制裁，陈恭澍则自驾小汽车在外面巡逻接应。

经呈报批准后，当日半夜里，行动开始，唐英杰越墙剪断电网，把四个行动员及王鲁翹拉上墙头，一个个跳下花园，警动了驻守在正屋旁边的汪精卫卫队室的卫士，他们对着围墙就扫了一梭快慢机子弹，唐英杰等六人迅速伏至树根后面。枪声停后，四个行动员就冲进卫队室对室内警告说：“你们已被包

围，我们已架好机枪，你们要动一动，就马上扫射。”就这样镇住了全班卫士。此时唐英杰和王鲁翹已冲进屋内，直奔汪精卫寝室，由王鲁翹用钥匙开门，但因过于紧张，手指发抖，把钥匙弄断了，唐英杰就用随带斧头把门劈开，冲进室内，看见一个人正在爬窗欲逃，唐英杰就问王鲁翹：“是不是他？”王鲁翹说了声“是的”，唐英杰就乒乒两枪，将他当场击毙。

当唐英杰等翻进汪寓花园围墙，卫士开枪扫射时，枪声就惊动了河内当局。法国总督就出动了大批军警，把汪寓团团围住。唐英杰和王鲁翹奔至花园翻墙逃逸时，唐英杰纵身上墙，似有不顾别人之志。王鲁翹就说：“你还不快拉我上去，当心我把你打死！”唐英杰知道王的枪法厉害，只好拉他一同逃出包围圈。在外面巡逻的陈恭澍，一手拿枪，一手开车，带着行动员冲出去回到了领事馆。所有行动员是否全部撤出，我记不清了。只记到其中一个陈邦国，被河内当局逮捕，在河内监押劳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河内当局作为爱国志士释放。王鲁翹和唐英杰逃出河内，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随同毛万里到上海，继续策划暗杀汪精卫，唐英杰在霞飞路附近被法捕房的安南巡捕拦抓，由于他会拳术，扭打时被他逃脱。王鲁翹则于八——九月间被法捕房抓去，解往河内监押劳动。后来与陈邦国同时释放，释放后在天津任稽查处长，在天津解放前经上海去台湾。

当陈恭澍得到唐英杰、王鲁翹汇报经过情况之后，大家都满怀喜悦，互庆成功，认为这次一定可以拿到大笔奖金了。不料许念曾经一打听，回来对陈恭澍说：“你们打错人了，被打死的是曾仲鸣，不是汪精卫。”原来，曾仲鸣应汪精卫的召请，从内地到河内与汪密商组织南京政府事宜。密谈后汪精卫

就叫曾仲鸣睡在他房间里，自己则睡在会客室沙发上。陈恭澍听了这个消息后，像泄了气的皮球，倒摊在床上唉声叹气，满怀喜悦顿时化为乌有。全部人员潜离河内，撤回香港，结束了一场由蒋介石亲自导演的假戏。

为什么说戴笠在河内暗杀汪精卫的丑剧，是一场蒋介石导演的假戏真做呢？原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批准。”这么一来，汪精卫就可以在陈恭澍的每次行动之前得到蒋介石的秘密通知，加以防范。我这样分析问题，还另有事实为证：

1. 在汪精卫到达河内发表艳电后不多天，军统局香港站秘书刘方雄获得一个情报，说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打电报给香港大东旅社经理，通知他坐什么轮船于某日到达香港，要大东旅社经理亲自到船上迎接。刘方雄把这个情报发密电向重庆局本部戴笠报告，并提出行动计划：届时把大东旅社经理扣留，另派行动人员化妆大东旅社经理上船迎接陈璧君下船，在跳板上开枪将她打死。”结果，局本部戴笠却复电说：“经报呈委座批示：“不必打草惊蛇。”此事的来往电文，是我经手翻译的。

2. 汪精卫艳电发表后，林柏生在香港马上积极响应，大肆捧场，南华日报上每天都有林柏生的这类文章。军统香港站为此向戴笠请示“杀一儆百”，但戴笠却复电说：“委座批示只准打伤，不准打死。”后来林柏生被打伤，军统局本部发给奖金三千元，此事的往来电文，也是我翻译的。所有这一切，不足以证明假戏真做的导演是蒋介石吗？

（申元、高荣 整理）

注：本文作者王绍谦，江山县城关镇人，1911年生，现任江山县政协委员。

江山县选举国大代表拾零

严松年

我于一九四四年担任第二届江山县参议员，县参议会经全体参议员选举，以毛钟除为参议长（国民党江山县党部副书记长），何汉章为副参议长，王克勤为秘书。参议会的新办公大楼（一九四三年兴建）在孔庙隔壁，后面通向国民党江山县党部，气派不小。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县长程运启煞有介事，在五月二日的《江声报》上公布了三十四名县参议员名单。江山县参议会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突然走运了呢？原来，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蒋介石反动集团在美国的支持和策划之下，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全部武装。与此同时，又重弹所谓“法统”论调，要继承“训政时期”的约法精神，进行“宪政”的筹备，计划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标榜“还政于民”，借以欺骗老百姓，以挽救其垂死的反动独裁统治。在蒋记国民党统治下设立的省、市、县各级参议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生的一个畸形儿。

我的一个朋友毛麟书，当时任湓头乡乡长，听说参议员有权监督政府，有权选举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

由国大代表选举产生总统，认为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职务，就来动员我出面竞选淤头乡的县参议员。我那时是凤林小学校长，看他对这件事十分热情，已知的选票又大部分在我们手里，于是便答应参加竞选。

我答应参加竞选之后，我的另一个朋友姜志纯又上门来表示希望我退出竞选。我说：“如果你自己想参加竞选，此事可以商量。”姜志纯是个很直爽的人，经我这样一说，就对我讲了心里话，他说：“我是受毛贯一的委托。毛贯一先生决定参加竞选，他希望你能把自己的选票让给他。”我于是又找到毛麟书商量，毛麟书认为各保的保民代表选票已牢牢的掌握在我们手里，这事不好让步。商量结果，我要姜志纯转告毛贯一说：“如果贯一先生愿意当个候补议员的话，就请选举他的保民代表一起到我这里吃饭（指宴请）。选举时，我只要多他一票也就可以了。”后来，毛贯一同意这样安排，我没有经过多么激烈的竞选，就当上了县参议员，同时按照规定辞去了凤林小学校长职务。

国大代表竞选开始，我负责当淤头乡的选举监票人，当时规定，凡十八岁以上有公民权的人都有一张选票，全乡的选票都在我手上。投票还没有开始，上面圈定的二位候选人何芝园和徐之圭就开始紧张活动起来。何芝园是军统局的第二处少将处长，徐之圭是汤恩伯在日本时的同学，又是浙江和福建两省的银行监理官，两人棋逢敌手，旗鼓相当。何、徐两家本是亲戚，何芝园前妻所生的女儿，嫁给徐之圭的哥哥徐之荣做媳妇，为了竞选国大代表，谁也不肯让谁，争夺十分激烈，甚至动武打架，徐之圭弟曾被何芝园的老婆打了耳光。

竞选一开始，徐之圭的妻子先来找我。因为徐家和我有点

亲戚关系，她叫我舅公。并且说：“孔祥熙最近要徐之圭到浙江当财政厅长，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财政厅做事！”我说：“我不想外出当官，再说杭州离江山也太远。”她又说：

“你怕太远吗？近的地方也有，之圭弟弟之润是巨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你到绥靖公署怎么样？”我表示谢绝，她接着又拿出一袋钞票给我。

我一看这么多钞票，呆了。她说：“这是给你代我摆酒请客用的，你收下吧。”我当时答应她一定帮忙，至于钞票的事，我交给我的同学刘从先收下，我当面交代说：“摆酒请客的事，由刘从先负责。”

经过讨价还价，何芝园和徐之圭把全县二十六乡分成各自竞选的势力范围，开展活动。后来他们争夺激烈，互相渗透，竟把脸皮全撕破了。有一天，副参议长何汉章突然来到淤头看望我，他是给他侄子何芝园拉选票来的，他一见到我，老远就向我点头打拜揖问好，然后便开口说：“我对淤头乡的选票希望不多，我只希望能够得到一部分选票，比如说，有二成或三成，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生不爱说假话，只好直爽地告诉他我已经答应帮徐之圭的忙了，我叫他另请高明。可是何汉章却苦苦纠缠住我不肯放，并说：“松年呀，你如果不答应帮忙，我只好下跪了。”

军统的手段果然厉害。何汉章走后他们便软硬兼施。不几天，聊堂鬼姜顺才和严元增，就散布出要暗杀我的空气，一时局势闹得很紧张。他们在淤头乡还请了副乡长毛光仁和保长毛谦谓二人，毛光仁为竞选运动出力，徐之圭答应给他第一个中尉职务，何芝园知道了，立即介绍毛光仁弟毛光裕当交警总队上尉指导员，这样，毛光裕自然不当中尉而去当上尉了。接着